



以文载道 向学而生

□叶文玲

5月初,《人民文学》为庆祝创刊70周年,向多位作家征求题字。收到邀请,同样已过古稀之年的我感慨万端,遥想当年与《人民文学》相识结缘的前尘往事,思绪翻腾,几乎夜不能寐,殚精竭虑,写下一首《南乡子》,为《人民文学》70周年贺寿:

文学第一刊,与国同寿七十年。淋漓笔墨多少事,冷暖。无尽人生见纸间。

自《丹梅》结缘,相伴随行有荣焉。恩师光年与朝垠,深念。美美与共永相连。

后来,我寄给主编施战军的是用毛笔写的这样四句:

与国同寿七十年,无尽人生在纸间,淋漓笔墨多少事,美美与共永相连。

《丹梅》是我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第一篇小说,1976年年末,还在工厂上班的我,鬼使神差地斗胆把几部小说的手稿一起寄给了《人民文学》,不料很快就收到了编辑的回信,邀请我赴京商谈改稿。于是在1977年初,我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,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。

今天的文学创作者,恐怕有点难以想象那时作为一个“工人业余作者”能够来到心目中的文学圣殿的心情。那种激动、晕眩与如梦似幻的幸福,相比最虔诚的信徒前往拜谒、或者最狂热的粉丝前去追星,也不遑多让。

作为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,我一直深深地记得那一刻。

那是1977年年初的一天。刚在天安门广场见识了花如雪雪如花的场面,见识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深情,我怀揣着一沓稿子,走进了“东四八条52号”的那幢楼房大门。

我的脸被朔风吹得冰冷,一双棉鞋上沾满雪泥。当我叩开了这间紧紧窄窄挤在一起的编辑室,就如走近了一炉火,顿感异常温暖。

“我要找写这封信给我的编辑同志……”我的声音是怯生生的,怯生生的声音里蓄满了30余年的忧喜苦乐,蕴含着对“擦火柴者”的全部信赖和希冀。

许以老师和向前大姐一齐迎过来,和蔼可亲地打量我,一边辨认着写作者的笔迹——“是朝垠,王朝垠!”

那时的朝垠同志,高挑、精瘦,戴副黑色宽边深度近视镜,讲话慢条斯理,一看就是一位常以灯为伴的夙夜劳作的编辑……后来他成了我尊敬信赖的

恩师和诤友。

小小的《丹梅》经他推荐交由主编张光年老师确定在《人民文学》3月份头条发表。此后,《雪飘除夕》也在头条发表。接连两次的“头条”,使得河南的朋友都为之一惊一喜。

秋天,《人民文学》张光年老师又组织了被茅盾先生寄以“老兵的希望”的短篇小说座谈会。这一做梦也没想到的机遇,何止是给我一介年轻业余作者的鼓舞!

我在难忘1977年春天和秋天的幸运时,深深铭记了文学界前辈的扶持之恩,深深铭记了《人民文学》、铭记了所有编辑对我的隆情厚谊。

如果说我这大半辈子,穷尽心力,在文学世界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的话,那么《人民文学》就像是那匹载着我在文学的广阔天地中尽情驰骋的战马,而张光年老师,无疑就是扶我上战马的人。

对于光年老师,我写过许多篇纪念文字,从《清泉滴心》《流水永恒》到最近的《风骨无尽,护我初心》,而我觉得这些还不够,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光年老师的敬仰与膜拜。中外文坛上,能写善文的作家不胜枚举,能够发现和提携新人的编辑也不在少数,而能够把这两种身份都集于一身的,光年老师绝对是中翘楚!

在我的文学生涯之初,给予我最大帮助的,首推张光年先生。

1977年10月,因为《人民文学》的邀约,我到了北京,到了会议召开地点——虎坊桥的远东饭店,我这个刚刚“冒”出来的“工人业余作者”,参加了由主编张光年亲自主持的“短篇小说座谈会”。

我无须重复那次会议的内容,也无须细述第一次见到所敬仰的长者们的难以言喻的激动,记忆中特别难以抹去的,是以往不曾道出的铭感在心的细节。《人民文学》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曾经告诉我:“光年同志看了我们送他的《丹梅》清样,很兴奋地对编辑们说:读了这篇小说,心情很愉快,我一推窗子,外面刚落过雪,一股清纯清亮的空气扑面而来,这和小说带给我们的清新气息是多么相似……听,光年同志在用诗人的语言称赞你呢!”

对我来说,一位文坛前辈、众所敬仰的诗人、文艺评论家、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词作者光未然,以如诗的语言勉励我这个刚刚冒头的业余作者,这暖心良言无疑是最及时的春雨。

泪别光年老师已有十几年,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,我只想对他:

光年老师,我永远不会忘记198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《无花果》时,是你委托文艺评论家孔罗荪先生为我写了序。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无梦谷》出版后,84岁高龄的您,竟以“日记体”加“书信体”的文本方式,写了一篇“读后感”,重践了19年前“以信代评”的承诺。

我想,对于这些编辑老师来说,继续坚持握紧自己手中的笔,是我们这些作者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回馈与报答。

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《人民文学》,在广大读者和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当然极为崇高。毋庸置疑,一本文学杂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,并非只是由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赋予的,还取决于那些在背后默默无闻、辛勤耕耘的编辑,是他们审慎而大胆的选择,是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,是他们对于文字以及文学、文化的卓越感知与衷心热爱,以及他们勤勤恳恳、不遗余力的皓首穷经,才让那些优秀的作品与作家得以昭之天日,流传世间。

据我所知,早在成立之初,《人民文学》便白纸黑字地为作者写下“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”的承诺,对于这样一家全国排名第一的文学期刊来说,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非常。而根据我的亲身体会,他们也确实做到了。朝垠老师在为我编发文章时,先后书信往来十余回,端的是“句句在理,字字从心”,是我一直奉为圭臬的箴言。

而这么多年来,虽然一代又一代的编辑业已老去、离开,但是这种对作者、对读者极端尊重和负责的态度,却始终未见丝毫消减。

2012年袁鹰老师以“我们伟大的母亲”为主题向我约稿,请我写一篇散文,我于是写了《还魂记》。后交与施战军主编,发表在2013年5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上,这也是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,倍感与有荣焉!由是,我真切地感受到《人民文学》一以贯之的编辑精神,几十年如一日,从未稍离,一直坚守,一直存在。

虽然作者和编辑会逐渐老去,读者会更新换代,然而《人民文学》的光芒,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退。它属于人民,也属于文学,因为它的名字就是《人民文学》,我以自己的名字曾经与它联系在一起而骄傲,我更祝愿70岁的它青春不老,万古长青!

我此生尽心尽力的职场

□桂道怡

《人民文学》与共和国同龄,创刊时主编茅盾请毛主席题词,毛主席写的是: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。”1975年复刊,编辑部写信给毛主席,请其《词六首》中所写的字作刊名。毛主席批示:“可以”。这封信,是我去中南海呈送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作为“国刊”,《人民文学》推出了第一批有实力和潜力的作家,为文学事业从起步到繁荣奠定了基础。那时看稿,切身感知《人民文学》是发现和促进作家展示出色成果的园地,所刊作品是高水平、有特色、吸引读者、影响广泛的篇章。相当时期形成默契:惟有在《人民文学》发作品,才会被称为作家。改革开放以来,诸多期刊问世,文坛佳作喷涌,新秀脱颖而出。《人民文学》以固有地位,保持着纯净清新、悦目赏心、雅致高贵、出类拔萃的传统品位和风味。

我1956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,被分配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。起先担任京津华北小说编辑。1957年春,从来稿中选出李国文的《改选》,得到编辑部主任李清泉赏识。那是我的第一个业绩,确认了我此生尽心尽力的职场,就在《人民文学》。

记得初审选的佳作还有:汪曾祺的《羊舍一夕》、浩然的《彩霞》(1962年);约稿所得名篇:周立波的《山那边人家》(1958年)、马烽的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(1959年)。1975年复刊,约到蒋子龙的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,此后,担任编辑部副主任、杂志社副主编,负责复审、终审,不再是个“第一读者”,经手所发作品数量多文体杂,难以逐一回忆。除掉“文革”,在岗32年,犹如审阅和鉴别稿件的“机器”。看一摞摞纸上文字耗时劳神,精力大多消磨于不靠谱的来稿。欣慰的是:推举了一系列刊发之后知名于世的作家作品。

在岗期间,切身感受我国文学鲜活的脉息和灵动的轨迹。即便政治当先时期,《人民文学》也坚持了以艺术品质为选用稿件的前提和根基。从责任编辑到当值主编,心灵默契,不言而喻,首先考量艺术水准,保证了所发表作品的高规格和纯质地,维系并发扬了我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独特的地位和相应的影响。

1977年秋,刘心武把他的小说《班主任》寄给我。作品写的虽是校园生活,但其意蕴深沉悠远,有开创和启示意义。1979年夏,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问世,切合民意,振奋民心。这两年间,这两篇作品,在读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。它们是高峰,也是转折。此后,文学作品社会效益逐渐回归常态。

在职期间,经历了我国文学起伏婉转的进程。我心中,《人民文学》既是春花烂漫、秋果琳琅的“展台”,又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着“航标”的作用。1998年秋我退休,结束了在《人民文学》一心一意有始有终的编辑生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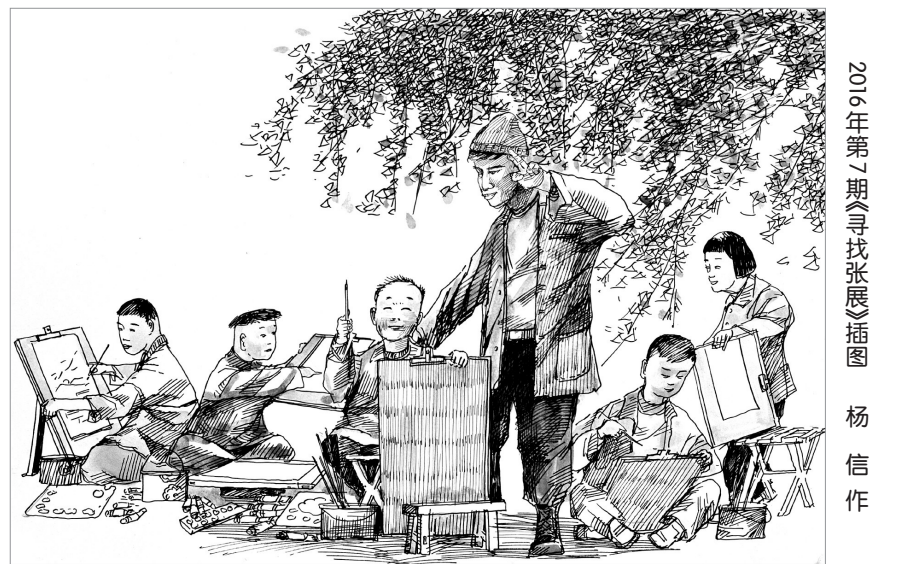
近些年来翻阅期刊,仍首先看《人民文学》。她是我的家园、我的故乡,是我倾注过心血的地方。而今捧读,精华荟萃,金玉满堂,更美好,更厚重,甚为欣慰。祝福她的生日,祝福她蓬蓬勃勃,郁郁葱葱,永远是我国文苑一株常青树。



2017年第11期《主角》插图 李晨作



2017年第12期《北归日记》插图 李晨作



2016年第7期《寻找张展》插图 杨信作

《人民文学》:文字的重量

□葛水平

很多年前,我以一个读者的高度走近《人民文学》,我甚至收藏了它六七十年代的一部分杂志。这些杂志的收藏缘于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个古旧交易市场。每周日的上午10点,阳光晃眼,或者是秋天,那一沓书平静地横列在静物之中,就那样,对准了眼,对准了不堪一击的岁月。

卖书人说:很重。文字是有重量的。我一直认为。很长一段时间,翻阅一沓旧杂志,仿佛过期的温暖再现。在重重叠叠的阅读中,那些老作家不时闪现,他们的文字记录了时间中的人和物事,伴随着拥挤的陌生的光阴远去,他们忠实的叙事为历史作证,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思想者,影响社会舆情。

一本杂志告诉了我知识分子的重量。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。但是,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。或者一本书,或者一份杂志,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,对于偏远小城的我来说收藏这些杂志简直近于奢侈,但它吊足了胃口。

一生中的不同阶段,生活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讯息,有些缘分踟躇在某一个时间段,我开始写作。那是2004年,我和胡学文在北京,穿越长安街,去某小区看望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宁小龄老师。2004年是我从小说走向生活的开始,同时又让我在生活中更加接近了小说的开始。那一刻的黄昏至今难忘,那个时候,对于时间,对于围绕自己的大千世界究竟是怀着一种怎样的认知呢。对于文学我还持着漠然的态度,北京太大了,当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被挤压的时候,脑海里就会不经意地掠过那一沓旧杂志,并非从写作的角度,而是从感性上认为,我不可能有作品出现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

那天,我们仨一起谈了很久,关于文学,关于写作,关于方向,小区里的小径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曲径,是人为的那种仄拐,在散步中说话,当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,根本无从判断现在所处的位置与出发地点相比有什么不同。一直到满月生辉时分,我答应回去马上写一个中篇,之后满怀信心离开。

在月光凛冽明亮的夜晚,我的写作信心在递减,那些旧杂志里一个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,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光明的距离。

《人民文学》给了我一个指向,我当时的欲望就搁浅在那里。除了地域身份外,我的作品必然带着农耕这一劳动方式所赋予的特点,是内在于村俗的,是家园的,自省的而不是观察的,不是“深入生活”,是在生活中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农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一方面,人民公社解体,集体农民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时代;另一方面,现代化经济在不断改写农业环境、生活方式和生产关系。社会变革中,周围的迷蒙和内心的不安全却是真实的存在,被拐走的乡村女性,她们是弱势者,不堪承受生存的压力,天底下最低姿态孤独无依的“生灵”,活着于她们是一个痛。

我由故乡的这些人写了中篇小说《喊山》。发表在2005年第11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,2006年这个中篇由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推荐并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

从小说递交到宁小龄手里那一刻到发表,一共修改了8稿。我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感谢这个人对于文字的严谨,正是他对文字的严谨让我获得了后来的一系列荣誉。

在我后来订阅的《人民文学》中,阅读有宁小龄老师责编的作品,总会想起电话里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话的声音,他习惯性地持有肯定态度,然后将很多问题引出,引发开来也往往言而得意在此,他的谈话为我揭开了眼罩,我感到严厉、委屈中,伴随莫名的惊悚。是一种对自己所办杂志的挚爱、守护,也是对作者创作水准的提升和尊重,一种心灵互通、彼此支持的温暖。

70年,对于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间事有着多么不同的意义。时间、岁月是世界上惟一捉摸不定的东西,人间事填充了它们。有多少作家从《人民文学》走出,对于写作者,时间是快速的,但是,文字在这里可以赢得更长的时间。

感谢《人民文学》,她给了我一个创作上的高度,并让我知道了,写作是我一生不可松懈的工作,它的丰富和神秘充满了巨大的诱惑,能够深入进去,又极其艰难,不是简单的发表一部作品就可以体悟。



《人民文学》:奇迹发生的地方

□田耳

我写小说始于1999年,大专毕业,失业。最初寄稿完全没有章法,待在小县城也不认识人,父亲说有个熟人是文学杂志主编,联系后无果。刚刚写出一批小说,发表时想着要尽快变成铅字,先发表在本地文联的内刊,经内刊编辑指导,弄到一些地市级公开文学刊物的地址。有一两年时间,我就往这些杂志寄,试图有所突破。我每次挑出三四个自觉成熟的短篇,每篇打印四五份,每个信封装两份,每次寄出10封信。寄一次稿要费一个下午,营业员和我熟了,还查查稿件是否可以寄到付。当时已经全部改为寄付。起初,我每年能上一个地市级刊物,其他都如泥牛入海。接下来两年,我的目标又锁定为省级刊物,每次还是10个信封寄出,效果依然一样,每年只发表一篇,几乎就是铁律。2004年的时候,我牙一咬,说既然发哪里都每年一篇,不如冲冲最大的刊物,于是同时寄了《人民文学》和《收获》。起初寄的是一个中篇,叫《你痒吗》,是发了狠写出来的。当时的文学观念,以为写得狠那才叫小说,才可能吸引神情漠然的编辑偶尔瞥一眼。那时候根本不担心一稿多投,因为基本不抱什么希望。结果那一年,几乎同时收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杨泥和《收获》杂志王继军的来信,都写了两页

纸,意思也都差不多:该文不适合本刊发表,但请把你写的别的小说寄过来。

这样的机会,我自是认真对待。2005年4月,我在《人民文学》“新浪潮”栏目发表短篇《狗日的狗》,是我在大刊发表的第一个作品。那个小说影响不大,当时在湖南经常碰面的刘恪老师,还批评这个小说写得随意,这么轻易出手可能让别人以为你不能写。我暗自说,这还“随意”或者“轻易”?心里有的体会,只能是“好不容易”。虽然第一篇差强人意,杨泥老师倒是对我关注,还把我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《衣钵》到处给人推荐。往来信件,她对我有具体指导,同年底又发表中篇《重叠影像》,发表后第一次见到了选刊。我忽然相信,自己写小说变得顺当起来。

2005年底我去贵州六盘水待了一个多月,和一个哑巴亲戚相处,印象深刻,想以他为原型写一个小说。最初是想把这个男哑巴亲戚写成女性,必须漂亮,然后发生一段爱情故事,街头混混与哑巴的爱情故事。杨泥老师听了我的想法,说不行,你写感情可能欠一点,写破案倒还对路,一开始写作,要照自己熟悉的写,以自己拿手招式练。

我相信编辑的经验之谈,再说也自知写男友情感是

自己的软肋,于是调整构思,2006年写出中篇小说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,写的是破案,当然哑巴与街头混混的爱情也没浪费,夹杂在破案叙述之中。这个中篇发表在同年12期《人民文学》杂志,得到两个选刊转载。但我个人对这小说并不看好,心里觉得,这是一篇“命题作文”。2007年我在上海读作家班,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申报时,湖南作协打来电话要我报,我手头没有样刊,打算放弃这个申报名额。没想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已将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报上去,更没想到这个中篇真就中奖。小说进入终评20篇的时候,杨泥老师打来电话,表示鼓励,并说这已是很好的成绩,获奖嘛吓下你的资历不够。真正获奖了,仍是杨泥老师第一时间打电话,告诉我这个结果。

毫不含糊地说,正是这次获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我得以进入县文联当创作员,此后写小说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专业,成为我的工作,让我一直写下去。我想起同乡先贤沈从文说过:“我怎么创造故事,故事怎么创造我。”小说是一种虚构,但它确乎在实际生活里予以优厚的馈赠。虽然写作生涯平淡且枯燥,但我自认为,我的虚构改变了现实境遇,平淡生活中也曾发生过奇迹。

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过中短篇小说七八篇,那几年我依赖连续的发表,不断的获奖,得到作家、评论家和读者朋友的认可,得以写作至今。今年《人民文学》创刊70周年,我回想最初发表的过程,衷心感谢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老师对自己的提携与指导,并希望更多的小说写作者,通过《人民文学》这一优良平台,获取更充足的写作权利。